

# 蘇聯對「第二世界」的宣傳活動

趙春山

## 一論非軍事工具在蘇聯對外政策中的運用

壹、導言

貳、蘇聯的宣傳動機

參、蘇聯的宣傳對象和宣傳主題

肆、蘇聯的宣傳媒體

伍、結論

### 壹、導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影響整個國際關係變動的一個重要因素，乃是蘇聯軍事力量的大幅擴張。軍力的加強，不但使蘇聯獲得一個超強的國際地位，並且也為蘇聯的對外政策，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實施工具。在外交決策過程中，長期扮演重要角色的是蘇聯外長葛羅米柯（Andrei A. Gromyko），即在一九七一年時指出：目前，任何一個重要的問題，如果沒有蘇聯的參與或是違背蘇聯的意願，皆無法獲得解決。<sup>①</sup>

使葛羅米柯如此自信的一個主要的因素，可能是來自於蘇聯對於全球「力量對比」（Correlation of Forces）的評估。根據蘇聯學者的說法，進入七〇年代以後，整個全球力量的對比，已朝向對「社會主義陣營」有利的方向發展，<sup>②</sup>其中以美蘇軍力據蘇聯學者的說法，進入七〇年代以後，整個全球力量的對比，已朝向對「社會主義陣營」有利的方向發展，<sup>②</sup>其中以美蘇軍力

① Pravda, 4. April 1971; translated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hereafter FBIS), *Daily Report-Soviet Union*, 6 April 1971, p. 77.

② 蘇聯學者有關「力量對比」學說的探討，參見 G. Shakhnazarov, "On the Problem of the Correlation of Forces," *Kommunist* (February 1974). Quoted in *Strategic Review* (Fall 1974):100-114; A. Sergiyev, "Leninism on the Correlation of Forces as a Fa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May 5, 1975): 99-107; Sh. Sanakoyev, "The World Today: Problem of the Correlation of Forces,"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November 11, 1974): 40-50. 諸方學者的典型代表著作者 Michael J. Deane, *The Soviet Concept of the "Correlation of Forces"* (Menlo Park, Calif.: Stanford Research Institute, 1976).

平衡的改變，最為明顯，對於國際局勢的影響也最為深遠。

就以美蘇戰略武力的比較而言，從一九六五年開始，蘇聯即加速其洲際彈道飛彈（ICBM）的部署，並且着手建造其「北極星」型的飛彈潛艇武力，以及為其「SS—九」式洲際彈道飛彈，試射多彈道。如此，美國的戰略優勢，開始面臨蘇聯的嚴重挑戰。<sup>③</sup>到了六〇年代末期，由於美國在軍備競賽方面，採取單方面的自制行動，以期待蘇聯的迎頭趕上，雙方的戰略差距，進一步地縮小了。總而言之，無論就戰略或傳統武力的層面看，蘇聯全球性的軍事能力，已經大幅地增加。蘇聯學者認為，就因為這種戰略平衡的改變，迫使美國重新檢討它的對外政策，採取了「以談判代替對抗」的政策。<sup>④</sup>

軍力增強了蘇聯的國際地位；相對地，為了使它的國際權力角色「名實相符」，蘇聯更進一步地運用軍力，在全球任何被視為關乎蘇聯利益的地區從事活動。曾經擔任蘇聯國防部長，同時也是軍事理論家的葛里契柯（A. A. Grechko），曾在一九七四年五月出版的蘇聯共黨理論刊物——「蘇聯共黨歷史問題」（Problems of History of the CPSU）中撰文表示：「在現階段，蘇聯軍隊的功能將不限於防衛祖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蘇聯軍力的外交政策行動中，蘇聯政府堅決反對『反革命』的輸出，反對壓迫政策，支持民族解放鬥爭，以及堅決對抗帝國主義者在全球任何遙遠地區可能出現的侵略舉動。」<sup>⑤</sup>

蘇聯運用軍事工具來執行對外政策的具體實例是表現在「第三世界」地區。西方的蘇聯問題專家發現。從一九七四年開始，蘇聯對「第三世界」的軍事干預，已有顯著增加的跡象。例如，蘇聯的海空軍曾在一九七五—七六年安哥拉內戰，一九七七—七八年的索馬利亞和衣索匹亞非洲之角的爭端，以及一九七八—七九年的阿富汗內戰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除了軍事上的直接干預外，蘇聯也透過展示實力的所謂「砲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軍事援助，以及利用代理人介入當地武裝衝突等行動，來運用它的軍事工具。<sup>⑥</sup>

研究蘇聯問題的人士都了解，在蘇聯對非共世界的長期鬥爭中，「戰爭」與「和平」在蘇聯共黨領導人的眼中，只是代表一刀兩面的字眼。兩者可以交互使用，並且可以透過辯證的觀點加以結合。換言之，「和平」對共黨而言，代表的是另一種型態的

③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1970s, A New Strategy for Peace (A Report to the Congress by Richard Nilon,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February 18, 1970, p.119.

④ G. Trofimenco,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October 1975):38.

⑤ A. A. Grechk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PSU in Building the Army of a Developed Socialist Society," Problems of History of the CPSU (May 1974). Translated by FBIS (May 1974).

⑥ 有關軍事工具和蘇聯對外政策相互關係的典型代表著作是Stephen S. Kaplan, Diplomacy of Power: Soviet Armed Forces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1).

「戰爭」方式。然而，由於軍事工具使用的可見度高，易於為人覺察，同樣地也比較容易加以防範；而共黨使用非軍事的和平攻勢時，相形之下，就常常遭到忽略了。這就是為什麼蘇聯戰後，常常不費一兵一卒，即達到往往發動戰爭都無法達到的政策目標的主要原因了。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蘇聯如何運用一個非軍事性的對外政策工具——宣傳，來實施它對「第三世界」的政策目標。

States), February 18, 1970, p. 119.

- ④ G. Trofimenco, "From Confrontation to Coexistence,"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October 1975): 38.  
⑤ A. A. Grechko,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PSU in Building the Army of a Developed Socialist Society," *Problems of History of the CPSU* (May 1974). Translated by FBIS (May 1974).

⑥ 有關軍事工具和蘇聯對外政策相互關係的典型代表著作是Stephen S. Kaplan, *Diplomacy of Power: Soviet Armed Forces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1).

「戰爭」方式。然而，由於軍事工具使用的可見度高，易於為人覺察，同樣地也比較容易加以防範；而共黨使用非軍事的和平攻勢時，相形之下，就常常遭到忽略了。這就是為什麼蘇聯戰後，常常不費一兵一卒，即達到往往發動戰爭都無法達到的政策目標的主要原因了。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即在探討蘇聯如何運用一個非軍事性的對外政策工具——宣傳，來實施它對「第三世界」的政策目標。

交通工具的日新月異，不僅縮短了國與國之間的距離，並且也促進了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關係。隨著羣衆政治的發展，今天的國際關係，已不再侷限於政府官員之間的來往，民衆積極和大規模的參與，使得對外政策中的心理和公衆輿論範疇，變得愈形重要。換言之，作為對外政策的一個非軍事性工具，宣傳所發揮的功效，已逐漸引起了世人的注意。根據赫斯提 (K. J. Holsti) 的說法：

「現代國際政治關係的一個獨特的面相是：政府透過外交官和宣傳家，刻意的想要影響國外民衆，以及影響那些特定的種族、階級、宗教、經濟或語言團體等人們的態度和行為。這些從事宣傳的官員希望上述的國外團體或全體民衆，能夠轉而影響其政府的態度和行動。」⑦

雖然宣傳一詞目前已經成爲探討國際政治和對外政策問題時一個不可忽視的概念，但根據倫登 (Kurt London) 教授的觀察，宣傳之日漸成爲國際關係的一個重要因素，實在一九一七年布爾什維克 (Bolshevik) 政權成立以後的事。⑧換言之，與世界其他國家比較，蘇聯應該是最重視對外宣傳，最有系統地運用宣傳工具的國家。

儘管蘇聯對於宣傳所下的定義和一般民主國家不同，⑨但基於研究的便利，本文仍選擇赫斯提對於宣傳的解釋，作為分析的

⑦ K. J.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2), p. 211.  
⑧ Kurt London,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East & West* (N.Y.: J.B. Lippincott Company, 1965), p. 254.  
⑨ 蘇聯將「宣傳」(propaganda) 和「鼓動」(agitation) 兩個概念加以明顯地區分。根據蘇聯出版的政治字典，「宣傳」被略定爲：「觀念、教條、知識和理論的傳播和闡釋，旨在促使民衆對其堅信不移。由於大眾媒體可使宣傳普遍深入民衆，故宣傳是一項有力的階級鬥爭工具。」「鼓動」則被略定爲：「傳播觀念和信息，以及透過談話、會議、廣播、電視、電影、報紙等媒介提出口號和訴求的一種行動方式。目的在影響人們的心靈和感覺。鼓動是社會階級之間和黨派之間的一種政治和意識形態鬥爭形式。」參考 Boris Putilov, ed., *Political Terms: A Short Guide* (Moscow: Novosti Press Agency Publishing House, 1982), p. 69, 4. 上述蘇聯的解釋或許不盡正確。史羅尼 (Stefan T. Possony) 教授認爲，「宣傳」訴求的對象較爲廣泛和無形，主要是讀者大眾，而「鼓動」則針對小部分，較爲固定，有形以及積極的目標團體而發。「宣傳」通常使用書本和雜誌，「鼓動」則大部分依賴口語。見 Stefan T. Possony, "Communist Psychological Warfare," in Robert Strausz-Hupé et al., *Protracted Conflict: A Challenging Study of Communist Strategy* (New York: Harper Colophon Books, 1963), p. 222.

架構。赫斯提在歸納瓜特（Terence Qualter）和揚恩（Kimball Young）兩名學者的看法後，提出了宣傳概念所包含的四項共同因素：(1)一個具有改變他人態度、意見和行為的「意向」（intention）的傳播者；(2)傳播者所使用的文字、口語或動作等「象徵」（symbol）；(3)傳播媒體；(4)聽眾、觀眾或是公共輿論研究使用的一個字彙——「對象」（target）。◎綜合以上四項因素出發，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包括：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宣傳動機，宣傳的對象和宣傳的主題，以及宣傳的媒體。

## 貳、蘇聯的宣傳動機

探討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宣傳動機，我們首先必須要了解蘇聯對於對外宣傳的重視，「第三世界」在蘇聯對外政策課題中所佔的地位，以及蘇聯為何運用宣傳來達成其對「第三世界」的政策目標等問題。

### 一、蘇聯的對外宣傳

對於共黨國家而言，「外交是內政的延長」這句話，特別具有意義。因此，在探討蘇聯的對外宣傳之前，我們必須先認識它的對內宣傳。從某種角度看，宣傳乃是蘇聯制度的一個特色。蘇聯領導階層對於宣傳的重視，主要來自其革命的經驗，以及革命後的政治發展需要。早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共黨革命之前，列寧（V.I. Lenin）在他的重要著作「從何着手」中，即強調了政治傳播的重要性，以及傳播力量在共黨革命過程中可能發揮的功能。例如，列寧注意到成立一份全俄報紙的必要，其成員可以進行宣傳、情報，以及組織的工作。針對報紙扮演的角色，列寧曾如此表示：

「報紙的作用並不限於傳播思想、進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軍。報紙不僅是集體的宣傳員和集體的鼓動員，而且是集體的組織者。就後一點來說，可以把報紙比做腳手架，它搭在正在修建的建築物周圍，顯示出建築物的輪廓，便利各個建築工人之間的來往，幫助他們分配工作和觀察有組織的勞動所獲得總成績。依靠報紙和同報紙聯繫自然而然會形成一種固定的組織，這種組織不僅從事地方工作，而且從事經常的共同的工作，教育自己的成員密切注視政治事件，考慮這些事件的意義和它們對各個不同居民階層的影響，擬定革命的黨影響這些事件的適當措施。」<sup>①</sup>

從列寧以後，歷任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在任何涉及宣傳和政治教育問題的演說和會議中，皆再三強調共黨應該把宣傳和鼓動，視為黨的一項中心任務。在為蘇共廿七屆大會草擬的黨綱中，蘇聯現行領導階層指出，大眾資訊和宣傳媒介在社會生活中扮演

① 列寧，「從何着手」，《列寧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一年），頁八。

② Holsti,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12.

演的角色已日益增高。蘇共認為，它將致力促使傳播媒介徹底分析國內外生活的趨勢和現象，以及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過程；促使這些媒體能支持新興和進步的事務，提出那些困擾民衆的緊要問題，並且建議各種解決問題的辦法。蘇共特別強調對所有傳播媒體建議各種解決問題的辦法。蘇共特別強調對外所有應注意發展電視業，盡力擴大民衆接收廣播和電視節目的管道並增進其意義。

義和它們對各個不同居民階層的影響，擬定革命的黨影響這些事件的適當措施。」<sup>⑩</sup>

從列寧以後，歷任克里姆林宮的領導人，在任何涉及宣傳和政治教育問題的演說和會議中，皆再三強調共黨應該把宣傳和鼓動，視為黨的一項中心任務。在為蘇共廿七屆大會草擬的黨綱中，蘇聯現行領導階層指出，大眾資訊和宣傳媒介在社會生活中扮演

的角色已日益增高。蘇共認為，它將致力促使傳播媒介徹底分析國內外生活的趨勢和現象，以及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過程；積極促使這些媒體能支持新興和進步的事務，提出那些困擾民衆的緊要問題，並且建議各種解決問題的辦法。蘇共特別強調對外所有傳播媒體建議各種解決問題的辦法。蘇共特別強調對所有傳播媒體提供必要的支援。同時，針對目前科技的高度發展，蘇共認為應注意發展電視業，盡力擴大民衆接收廣播和電視節目的管道並增進其意義；同時，應提升其理論和藝術的層面，強化節目的吸引力。<sup>⑪</sup>

從以上的論述，我們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宣傳在共黨革命過程中的任務是傳播革命的意識，激發革命的熱情來推翻現存的政治建制和社會秩序。當革命成功，進入所謂的後革命時期，宣傳的目的則在為共黨的統治，以及從事社會主義的建設服務。無論是革命前或革命後的宣傳，都需要一個傳播者來承擔這樣的任務。於是，宣傳和組織的結合，遂成為共黨傳播理論的特色。共黨經由傳播吸收新的成員，而此新的成員隨後必須參與傳播共黨信仰的工作。

在列寧的心目中，進行革命宣傳的組織，必須是一個「革命家的組織」（organisation of revolutionaries），也是由那些將革命行動視為本身職業的成員們所組成。<sup>⑫</sup>列寧認為工人本身是無法發展出一套社會主義的意識的，工人的政治覺悟只有通過外在的影響而產生。因此，這個工作需要由革命的社會主義知識分子來擔任。這些人有足夠的精神、毅力和恆心來實行政治闘爭。他們不但要推動革命，並且要教育羣衆進行革命。

當革命完成後，這種政治社會化的工作就落到共黨的身上。在蘇聯學者的眼中，所謂「政治社會化」的特點，主要是「一種「教育和訓練」的功能。經由教育和訓練的過程，共黨組織促使一般民衆相信蘇聯政治體系的合法和正確性，以及相信共黨領導階層所擬定的那些目標。為了達成此一目的，共黨運用各種方法和工具，意圖贏取民衆的心靈。<sup>⑬</sup>

作為政治社會化的一個主要工具，共產組織自然不容許大眾傳播媒介脫離它的控制之外。早在一九〇五年秋天，列寧即主張黨的報紙必須附屬於黨（恩格斯認為黨報可以獨立於黨的權威之外）。列寧認為，黨員的寫作和新聞活動，必須成為共黨組織和系統化工作的一部分。列寧同時表示：「報紙應該變成各種黨組織的一個組織，其作者也應是這些黨組織的成員。各種發行和出版中心，書店和讀書室，圖書館和類似機構，都必須置於黨的控制之下。」<sup>⑭</sup>

⑩ FBIS, Supplement, 28 October 1985, pp. 20-21.

⑪ V.I. Lenin, *What Is To Be Don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3), p. 109.

⑫ Ronald J. Hill and Peter Frank,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Bost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81), p. 77.

⑬ V.I. Lenin,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Literature," November 13(26), 1905, p. 46, quoted in Wolfgang Leonhard, *Three Faces of Marxism: The Political Concepts of Soviet Ideology, Maoism, and Humanist Marxism* (New York: Paragon Books, 1979), p. 55.

時至今日，蘇聯仍將新聞事業當作黨和政府御用的工具。如果報紙言論違反黨的旨意，共黨當局保留干預的權利。「黨組織必須能夠運用各種大眾資訊和宣傳的方法，注意到它的工作的功效，提昇記者和宣傳人員的政治素養和職業競爭能力。」此外，「黨應協調和指導所有意識形態部門的活動，使它們能成功地完成塑造一個建設共產主義『新人』的工作。」<sup>⑩</sup>

雖然蘇聯對外宣傳和對內宣傳追求的目標不同，但從蘇聯對於宣傳的重視，以及系統化地運用宣傳媒介，我們可以肯定，其運用對外宣傳的意向，必然受到對內宣傳的影響。換言之，就像蘇聯內外政策不可分割的關係那樣，蘇聯也把其對外對內宣傳視為一個整體。這點可以從共產主義意識形態概念被視為一個普遍性運動的說法中，得到印證。<sup>⑪</sup>

從意識形態的觀點而言，蘇聯一直以共產主義「彌賽亞」（Messianism）的傳播者自居。其對外政策自稱為「社會主義的對外政策」（socialist foreign policy），它的性質，基本的原則，乃至於主要的方針，被視為來自社會主義制度的特性，以及取決於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論與實際。固著於社會主義外交和對外政策的是，馬列主義的研究社會現象的方法。它是以分析個別國家內部和國際社會中，各種階級和政治勢力的集團為基礎，並且是基於對世界相互關係的過程加以檢視，以確定這些過程發展的主要趨勢，而得到的方法。<sup>⑫</sup>換言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對外政策，應該具有國際主義的色彩。對於這點，列寧早在十月革命前就已明白揭示：「無產階級的對外政策，是要和先進國家的革命者，以及和所有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對抗任何帝國主義者。」<sup>⑬</sup>

蘇聯身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自然把推動和宣傳世界共黨革命看作它的國際主義任務。蘇聯甚至把這些任務，明確地列於它的「憲法」條文中。<sup>⑭</sup>

即使從國家利益的觀點看，雖然蘇聯有其特殊的利益，但蘇聯學者認為這些利益並沒有違背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國際無產階級也沒有和蘇聯相矛盾的利益。」<sup>⑮</sup>蘇聯的說法，顯然是從國際主義的觀點，來解釋蘇聯對於安全和權力利益的追求。因為列

<sup>⑯</sup> Hill and Frank,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pp. 133-134.

<sup>⑰</sup> London,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p. 293.  
<sup>⑱</sup> Sh. P. Sanakoyev and N.I. Kapchenko, *Socialism: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6), pp. 27-28.

<sup>⑲</sup> V.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5, p. 87, quoted in Sanakoyev and Kapchenko, *Socialism*, p. 26.

<sup>⑳</sup> 在蘇聯現行憲法（一九七七）第四章第十八款當中，除了表示蘇聯對外政策的目標在於國民共產主義建設確保有利國際條件，以及防衛蘇聯國家利益外，特別強調了鞏固世界社會主義地位，支持各地人民為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所從事的鬥爭。參見 *The Constitution (Fundamental Law) of the USSR*, 1977, quoted in David Lane, *Politics & Society in the USS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appendix c/2, p. 559.

<sup>㉑</sup> W.K. Knorr, *Fascism, Social-Democracy and the Communists* (Moscow, 1933), Quoted in Vernon V. Aspaturian,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 ed. Roy C. Macridi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6), p. 167.

別強調了鞏固世界社會主義地位，扶持各族人民民族解放和社會進步所從事的鬥爭。據那 *The Constitution (Fundamental Law) of the USSR, 1977*, quoted in David Lane, *Politics & Society in the USS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78), appendix c/2, p. 559.

◎ W.K. Knorr, in *Fascism, Social-Democracy and the Communists* (Moscow, 1933), Quoted in Vernon V. Aspaturian,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Foreign Policy in World Politics*, ed. Roy C. Macridi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76), p. 167.

寧曾經說過：「爲了世界無產階級對抗世界資產階級的鬭爭，爲了防備資產階級的陰謀，維持並加強蘇維埃政府是必要的。」◎ 蘇聯學者更引申列寧的觀點，視「蘇聯的經濟和國防潛力爲領導人類進入社會主義世界革命過程的一部分」，認爲「蘇聯是這一革命和解放運動的中堅，使用蘇聯力量做到的每一項成就，都使千萬人民有不可抑制的鼓舞，並且加強整個社會主義體系的能力，爲體系內各國邁向共產主義鋪路。」◎ 很顯然地，就共黨領袖而言，蘇聯的國家利益是加強其能力和權力來促進共產主義，共黨意識形態未使其「國家目標」(national objectives)與「國際目標」(international objectives)發生矛盾。◎

如同國內宣傳那樣，蘇聯實施對外政策所進行的宣傳工作，也是在共黨組織的控制和監督之下。在此，我們要強調的是蘇聯共黨在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自我認定的角色。蘇聯共黨自認是「國際共黨和工人階級運動的主要一份子，堅守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以及促進國際共黨和工人階級運動的團結。」蘇聯學者特別指出，由於蘇共豐富的革命經驗和持續的國際主義，它對建立新社會的貢獻以及維護和加強和平所作的無私鬭爭，已經贏得「舉世推崇」並爲各國姐妹黨看成是全世界革命運動的範範。◎

由於共黨在極權主義社會中對於大眾傳播媒介的獨占性控制，加上蘇共特殊的國際性角色，蘇聯政府的對外宣傳，也是置於蘇共組織的控制和監督下進行。在蘇聯共黨組織體系中，「政治局」(politburo)是決策的機構，在「政治局」的監督下透過中央委員會轄下的五個「部」(department)來進行對外宣傳和鼓動的工作。這五個部包括「宣傳部」(Propaganda Department)，「駐外幹部部」(Cadres Abroad Department)，「國際部」(International Department)，「國際新聞部」(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Department)和「對集團政黨聯絡部」(Liaison with Bloc Parties Department)。上述各部之中，以「國際部」、「國際新聞部」和「駐外幹部部」最爲重要。其職掌和在對外宣傳方面發揮的功能，值得進一步加以介紹：

- (1) 「國際部」…當「共產國際」(Comintern)在一九四三年解散後，這個部門即負責促進世界共黨革命的工作。蘇聯利用此部門和那些用來散播蘇聯宣傳的外國組織，進行聯絡的工作。
- (2) 「國際新聞部」…決定那些蘇聯政策應該公開討論，以及如何將這些政策提供給不同的國際輿論。這個機構的另一主要任務是對抗西方媒介透過新聞自由流通對蘇聯政策造成的不利影響。

◎ V.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6), 1900-192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66), p. 609.

◎ V.I. Popov, I.D. Orsyany, V.P. Nikhamin, eds., *A Stud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5), pp. 14-15.

◎ Zbigniew K. Brzezinski, *Ideology and Power in Soviet Politics* (New York: Frederick A. Prager, Publishers, 1967), p. 142.

◎ Hill and Frank,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p. 134.

(3) 「駐外幹部部」：這個機構扮演的是協調中心的角色，負責向共黨國家與友好國家的外交團體，傳達蘇聯的宣傳路線。◎

除了共黨中央組織以外，蘇聯政府的有關部門，特別是外交部和「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的相關機構，也在蘇聯對外宣傳方面，負有重要的任務。◎

除了組織和理論外，蘇聯在宣傳和相關地下活動所支出的費用，也可看出蘇聯影響國外特定對象的意圖。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最保守的估計，蘇聯在這方面的花費，每年平均達三十億美元的數目（見附表一）

## 二、「第三世界」的重要價值

在蘇聯對外政策中，「第三世界」具有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和戰略方面的意義。

先就意識形態而論，列寧對馬克思主義的一個主要修正，是把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革命鬭爭和落後地區的民族解放鬭爭，聯繫起來。由於帝國主義的時代把世界分裂為帝國主義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兩個部分，列寧認為應該從國際性的角度來看待民族

◎ Richard F. Staar, *USSR Foreign Policies After Detente*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p. 64-65.

◎ 「國安會」的宣傳活動主要透過轉下「第一總管理處」（First Chief Directorate）即「A勤務局」（Service A），各地區的分部，以及「國安會」的駐外機構來進行。參見Charles A. Sorrels, *Soviet Propaganda Campaign against NATO* (U. S. Arms Control and Disarmament Agency, October 1983), A2.

附表一 蘇聯宣傳開支

（百萬美元計）

預算項目	經費
蘇共「國際部」	\$ 100
蘇共「國際新聞部」	50
「塔斯社」(TASS)	550
「消息社」(Novosti)	500
「真理報」(Pravda)	250
「消息報」(Izvestia)	200
「新時代」(New Times)和其他期刊	200
「莫斯科電台」(Moscow radio)對外廣播	700
蘇聯駐外使館新聞部門	50
秘密電台	100
國際共黨前衛組織	63
對外國共黨的資助	50
「國安會」的「勤務局」	50
「國安會」駐外機構的地下活動	100
支持民族解放陣線	200
特殊運動（包括反對北約組織現代化運動）	200
總計	\$3,363

資料來源：引自Staar, *USSR Foreign Policies After Detente*, p. 64.

問題。對列寧而言，「民族問題是一國世界性的現象。」他對民族問題的分析使他預言：由於先進工業國家內部社會主義工人階級革命，以及亞、非、拉丁美洲被壓迫人民民族解放鬪爭，彼此相互聯繫的結果，帝國主義終將瓦解。◎當列寧致力於探究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先決條件時，又注意到民族自決權力的問題，理由是相當清楚的。王列寧一九一九年

繫起來。由於帝國主義的時代把世界分裂為帝國主義壓迫民族和被壓迫民族兩個部分，列寧認為應該從國際性的角度來看待民族

◎ Richard F. Staar, *USSR Foreign Policies After Detente* (Stanford,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5), pp. 64-65.

◎ 「國安會」的宣傳活動在蘇聯過境上「第一總理機關」(First Cheb Directorate)和「A動務局」(Service A)，各地區招分部，以及「國安會」的駐外機構來進行。輪椅Charles A. Sorrels, *Soviet Propaganda Campaign against NATO* (U. S. Arms Control Disarmament Agency, October 1983), A2.

問題。對列寧而言，「民族問題是一國世界性的現象。」他對民族問題的分析使他預言：由於先進工業國家內部社會主義工人階級革命，以及亞、非、拉丁美洲被壓迫人民民族解放鬥爭，彼此相互聯繫的結果，帝國主義終將瓦解。◎

當列寧致力於探究社會主義革命成功的先決條件時，又注意到民族自決權力的問題，理由是相當清楚的。在列寧一九一六年一月所寫的一篇題為「社會主義革命和民族自決權力」(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the Right of Nations to Self-Determination)的文章中，列寧即明白表示：無產階級應該為那些被他們自己民族所壓迫的殖民地和民族，要求政治分離的理由。否則的話，所謂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將徒具虛名。而被壓迫民族和壓迫民族工人之間的互信和團結，也不可能實現。◎

列寧對於民族問題的重視，使國際共黨的注意力，從黯淡的西歐革命運動，轉向了落後的東方。列寧的繼任者史達林(J. Stalin)（中共譯斯大林）在其著作中即提出：「一分鐘也不能忘記東方，至少因為它是世界帝國主義『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和最可靠』的後方。」◎基於這一認識，史達林認為：「共產主義的任務就是要打破東方被壓迫民族數百年來的沉睡，用革命的解放精神來感染這些國家的工人和農民，喚起他們去反對帝國主義，從而使世界帝國主義失去它的『最可靠』的後方，失去它的『取之不盡』的後備力量。」而共產黨人則應該「參與東方日益增長的自發運動，向前發展這種運動，使它成為自覺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至此，史達林下了一個結論：「誰想要社會主義勝利，誰就不能忘記東方。」◎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昔日殖民地紛紛獲得獨立，不僅在東方，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新興民族國家成為國際舞台的新角色。但從意識形態的觀點，蘇聯並沒有放棄將「第三世界」納入其世界革命的軌道。只是，蘇聯承認，民族解放運動已逐漸失去其「民族的」特性，代之以「階級的」特點。例如，蘇共故總書記布里茲涅夫(L. I. Brezhnev)在蘇共二十四屆大會所作的報告中，表示「在許多國家，民族解放鬥爭實際上已轉變為對抗封建和資本主義剝削關係的鬥爭。」在這種情況下，蘇聯理論家認為，解放鬥爭不僅繼續不斷，並且獲得進展。而鬥爭的目標是：「消除經濟依賴，提供民族國家機構適當的經濟基礎，克服過時的社會形式，以及在資本主義世界重新建構一些基本的經濟聯繫和關係。」◎

雖然民族解放運動的內涵已經因為昔日殖民帝國的瓦解而有了改變，但只要共黨世界革命的終極目標未變，蘇聯仍將視「第三世界」國家為其消滅資本主義的盟友。

◎ 諸B. G. Gafurov and G. F. Kim, eds., *Lenin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in The East*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8), pp. 5-6.

◎ Ibid., p. 6.

◎ 斯大林，「不要忘記東方」，《斯大林全集》(第四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年)，頁1151。

◎ 同上，頁153～154。

◎ K. N. Brutents, *National Liberation Revolutions Toda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7), pp. 8-9.

從權力政治的考慮，「第三世界」是國際社會之中，一股不容輕視的力量。這些亞、非、拉丁美洲國家在國際政治上形成的第三勢力，使自由世界和共黨集團對之不得不側目而視。蘇聯國際關係學者利比迪夫（N. I. Lebedev）即表示：這些剛剛擺脫殖民和次殖民壓迫枷鎖，並且採取獨立發展路線的新興國家，在現代世界中正扮演日增重要的角色，並且使整個國際關係產生巨大的改變。<sup>③3</sup>

「第三世界」對蘇聯的政治意義是提供蘇聯擴大影響力的場地，使蘇聯藉着參與「第三世界」事務的機會，真正得以從一個區域的角色，轉變為全球性的超強角色。此外，從蘇聯「力量對比」的概念出發，「民族解放運動」被視為評估實力消長的「國際運動」因素的一環。其他的「運動」（movements）包括：「國際共黨運動」，「不結盟運動」，以及「人民和平運動」。長期在蘇聯對「第三世界」政策決策過程中具有重大影響力的蘇聯學者烏揚諾夫斯基（R. Ulyanovsky）即曾明白表示：

「民族解放運動的一個特色是亞非等許多國家的興起。這些國家在決定人類前途方面扮演積極角色，並且實質上改變了世界政治結構和權力平衡，而對帝國主義產生破壞的作用。這是國際工人階級和被壓迫人民從事解放鬭爭的結果，具有重大意義。」<sup>③4</sup>

換言之，在東、西雙方的權力競賽中，蘇聯的目標消極的是避免「第三世界」國家投入西方的陣營，積極的則是爭取這些國家作為蘇聯與西方鬭爭時的盟友。

「第三世界」對蘇聯的經濟價值，主要在於這個廣大的地區可以提供蘇聯所需的原料物資，並且是蘇聯經濟產品和武器供應的市場。此外，「第三世界」也可為合乎蘇聯的經濟整合，創造一個機會。<sup>③5</sup>同樣地，蘇聯也了解到「第三世界」地區的原料和市場，亦可被資本主義國家用來作為對抗社會主義陣營的武器。蘇聯近年來對亞太地區的日益重視，經濟是一項重要的考慮。根據蘇聯亞洲事務專家柯瓦年科（Ivan Kovalenko）的估計，亞太地區佔整個資本主義國家工業總產量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其中，亞太地區生產了百分之六十七的汽車，百分之七十七的電視和收音機，百分之五十的鋁，百分之五十四的鋼鐵，以及三分之二的船隻和合成纖維。<sup>③6</sup>蘇聯的目標是一方面透過它和亞太地區的經濟聯繫滿足它的經濟需要；另一方面是破壞亞太地區和西方

③3 N. I. Lebedev, *A New Sta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lations* (Oxford: Pergamon Press, 1978), p. 149.

③4 P. Ulyanovsky, "Urgent Problems of the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in *National Liberation Movement: Current Problems* (Moscow: Novosti Press Agency Publishing House), p. 15.

③5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Third World, 1980-85: An Imperial Burden or Political Asset?*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p. 8.

③6 I. I. Koralenko, "Cooperation, not Confrontation: Key to Asian Security," *Far Eastern Affairs* (Moscow) (July-September 1986):

工業國家的關係，避免後者獨佔市場、原料以及獲取投資的利益。

最後，我們必須強調「第三世界」的戰略地位，對於蘇聯的地緣政治重要意義。翻開地圖，我們發現第三世界佔據了整個東

- ◎ U. 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Committee on Foreign Affairs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Third World, 1980-85: An Imperial Burden or Political Asset?* (Washington D. 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5), p. 8.
- ◎ I.I. Korolenko, "Cooperation, not Confrontation: Key to Asian Security," *Far Eastern Affairs* (Moscow) (July-September 1986):

工業國家的關係，避免後者獨佔市場、原料以及獲取投資的利益。

最後，我們必須強調「第三世界」的戰略地位，對於蘇聯的地緣政治重要意義。翻開地圖，我們發現世界上許多重要海峽和海洋交通的據點，都位於「第三世界」地區。就以中東為例，針對石油與西方經濟的依存關係，蘇聯已經把波斯灣產油地區作為目標，展開一種「邊緣地帶戰略」(rimlands strategy)。蘇聯的戰略構想是在衣索匹亞、南葉門、安哥拉、莫三鼻克、阿富汗取得據點，從南北兩翼，對波斯灣油田進行包圍。蘇聯希望在產油地區建立影響力後，進一步控制油路運輸，以阻絕西方的能源供應。

### 三、蘇聯的政策工具

雖然「第三世界」對蘇聯具有重要的價值，但與西方國家，甚至與中共比較，蘇聯並沒有成功地達成它對此一地區的外交政策目標。主要的原因是蘇聯缺乏實施其政策的足夠能力。

從意識形態的觀點看，如前所述，所謂「民族解放鬥爭」的口號，已經因為新興民族國家的獨立，而失去了它的吸引力。儘管蘇聯強調以經濟鬥爭作為新的內容，但蘇聯提供的援助顯然是口惠而實不至。例如，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第三世界」國家對國際事物的注意，從過去的強調「反殖民主義鬥爭」，轉而呼籲建立一套「新國際經濟秩序」(NIEO)。從經濟發展的程度比較，「第三世界」大都屬於低度發展或發展中的「南方」國家，它們要求更多的經濟自決權，享有充分的民族資源主權，以及平等參與國際機構等權力。同時，針對貿易、援助、國外投資、科技轉移、貨幣制度等問題，希望與富有的、工業化的「北方」國家，從事「對話」。雖然此一「對話」目前尚無具體進展，但「第三世界」國家，仍企圖運用集團壓力，透過國際組織和國際會議，以迫使富國接納「新國際經濟秩序」的主張。

對於「第三世界」的主張，蘇聯的反應並不熱烈。莫斯科的宣傳喉舌只是一味指責西方過去對「第三世界」的殖民剝削政策，應為今天這些國家貧窮負責。蘇聯表示支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自決，但強調只有透過社會主義國家的幫助和在國際和解環境下，才能達到這個目標。換言之，蘇聯認為只有支持它的外交政策，「第三世界」國家才有解決優先課題的希望。<sup>⑤</sup>

對於蘇聯口頭上的支持，「第三世界」已逐漸了解其背後隱藏的動機，它們不願陷入東、西對抗的泥淖之中。這些發展中國家期望經濟援助，無論來自資本主義世界或是社會主義陣營。而蘇聯本身經濟能力的限制，使得它和西方國家在爭取「第三世界」的立場，詳見 Robert H. Donaldson, "The Second World The Third World,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in Robert H. Donaldson, ed.,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Third World: Successes and Failure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1), pp. 63-372.

」的這場金元競賽中，註定處於下風的地位。到目前為止，蘇聯的對外經援對象，仍以它的東歐盟友為主。蘇聯在「第三世界」的經援國家，則偏重越南、古巴等共黨國家。儘管布里茲涅夫死後的克里姆林宮領袖，已經把經濟改革列為國內優先課題，但我們並不預期蘇聯在可見的將來，可以依賴經濟作為它對外政策的主要工具。

在本文「導言」部份，我們已經簡短地分析了蘇聯軍力在其對外政策實施中扮演的角色。事實顯示，透過軍事干預和軍事援助的手段，蘇聯已成功地在許多不結盟國家獲取據點，為蘇聯和當地的政治、經濟合作關係，奠定了基礎。由於接受蘇聯的軍援，許多「第三世界」國家成了蘇聯對外政策的代理人，扮演蘇聯對抗西方的馬前卒角色。但是蘇聯運用軍事工具以獲取政治影響力並非漫無限制。許多個案研究顯示，蘇聯的軍事援助並沒有使受援國的內外政策受到莫斯科的影響。蘇聯也未能促使其「代理人」的政策目標，符合蘇聯的願望。舉例而言，雖然伊拉克和敘利亞曾獲得蘇聯大量的軍事援助，但當它們的重要利益面臨搖擺不定的情況時，這兩個國家立刻對蘇聯採取敵對的立場。同樣的情況是，阿爾及利亞儘管接受蘇聯援助，但却避免和蘇聯公開維持密切關係；利比亞則對蘇聯在中東的企圖，一直保持疑慮的態度。蘇聯運用軍援最失敗的例子可能是埃及和印尼兩個國家。蘇聯和埃及的交惡，使莫斯科失去了它在此一阿拉伯最重要國家的地位和影響力；而印尼一九六五年的共黨流產政變，導至蘇聯的退出印尼，對蘇聯在整個東南亞地區的戰略地位，構成一項難以彌補的重大打擊。<sup>③</sup>

蘇聯軍事干涉阿富汗的結果，也使它付出了相當大的代價。「第三世界」國家認為蘇聯的舉動，違背了它一貫標榜的支援民族解放鬥爭口號。蘇聯的行動也影響到它和其他鄰近國家的關係。巴基斯坦、伊朗和其他回教國家對蘇聯的阿富汗政策，採取不利的反應。中共更把蘇聯在阿國的駐軍，視為雙方關係正常化的一項重要障礙。<sup>④</sup> 蘇聯最後之決定自阿富汗撤軍，即是基於上述利弊得失的考慮。

由於使用軍事工具受到的限制，以及蘇聯經濟能力的不足，公開的宣傳配合秘密的「積極措施」(active measures)遂成為蘇聯實施對第三世界政策目標的主要手段<sup>⑤</sup>。隨着戈巴契夫的入主克里姆林宮，蘇聯的政治發展邁向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對

③ Roger F. Pajak, "The Effectiveness of Soviet Arms Aid Diplomacy in the Third World," in Donaldson,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Third World* pp. 397-398.

④ Zalmay Khalilzad, "Moscow's Afghan War," *Problems of Communism* 35 (Jan-Feb 1986): 13-14.

⑤ 「積極措施」在蘇聯上指的是蘇聯全國對其他國家政府的政策，腐蝕其領導權和機構的信心，破壞其政府與民間的關係，乃對於削弱其政府和民間的對抗。積極措施常被用來欺騙某一個政府或民間的對象，以及刻意曲解此一對象對事實的認知。有關蘇聯對「積極措施」的運用，詳見 Roy Godson and Richard H. Shultz, "Active Measures in Soviet Strategy," in Robbin F. Lavid and Erik P. Hoffmann, ed.,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p. 207-215.

外關係方面，戈巴契夫被視為是一個善於運用傳播媒體的蘇聯新一代共黨領袖。而戈某強調的「開放」(glasnost)政策，也意味着蘇聯今後將強化對外宣傳工具的使用。尤其是戈巴契夫上臺後，蘇聯對外政策的憂患果真「在頭」。

。[積極措施]常被用來欺騙某——政府或民間的參象，以及故意曲解此——參象對某事在說好。本題意在說明：從某事件到某事件的發展……

Richard H. Shultz, "Active Measures in Soviet Strategy," in Robbin F. David and Erik P. Hoffmann, ed., *Soviet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 (New York: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1986), pp. 207-215.

外關係方面，戈巴契夫被視為是一個善於運用傳播媒體的蘇聯新一代共黨領袖。而戈某強調的「開放」(glasnost)政策，也意味着蘇聯今後將強化對外宣傳工具的使用。尤其是戈巴契夫上臺後，蘇聯對外政策的優先課題，已從過去的強調美蘇關係，轉而重視蘇聯與「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如此，蘇聯對這個地區的宣傳攻勢，將成為蘇聯整個對外宣傳的重點。宣傳工具的使用，可以讓蘇聯節省更多的經濟資源，用來從事內部的經濟改革；可以避免軍事介入導致第三世界國家的疑懼；可以減少與美國發生地區性衝突的危險；最重要的是，可以依照蘇聯本身的意思，塑造一個有利於推展蘇聯國家利益的國際形象。

### 三、蘇聯的宣傳對象和宣傳主題

蘇聯對外宣傳的對象和宣傳的主題(theme)，彼此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換言之，蘇聯往往根據不同的對象，而使用不同的符號和象徵。在「第三世界」，蘇聯依其特定的宣傳對象，其使用的主題，和西方國家的宣傳，有明顯的不同。大體而言，蘇聯選擇的對象和主題，受到蘇聯對第三世界政策的影響。

#### 一、「左翼」和「右翼」戰略 下的宣傳對象

從一九一七年俄國共黨革命成功以來，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政策，約略可以區分為「左翼」(Left wing)和「右翼」(right-wing)兩個戰略階段，彼此交相運用(見附表一)。雖然這兩項戰略的特點，是以蘇聯的國內政治發展為榜的，但却和蘇聯的「第三世界」政策，息息相關。所謂「左」、「右」戰略的區別，其環繞的問題是共黨奪取政權或擴大蘇聯影響力時，應該如何選擇適當的盟友。<sup>④</sup>從對外政策的觀點而言，我們特別重視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影響力問題。這個問題幾乎成了蘇聯在第三世界選擇宣傳對象和擬訂宣傳主題的必要條件。

附表二 蘇聯對「第三世界」政策的演變

期間	取向	特徵
1917-1921	左翼	戰時共產主義
1921-1928	右翼	新經濟政策
1928-1935	左翼	「第三時期」
1935-1939	右翼	人民陣線
1939-1941	右翼	德蘇協定
1941-1947	右翼	戰時同盟
1947-1952	左翼	日丹諾夫主義
1954-1964	右翼	赫魯曉夫對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採開放政策
1964-1972	右翼	垂死的赫魯曉夫主義
1973-1982	左翼	支持馬列主義先鋒黨派
1982-	右翼	安德洛波夫——戈巴契夫政策

資料來源：Francis Fukuyama, "Patterns of Soviet Third World Policy," *Problems of Communism* 36 (Sep-Oct 1987):2. 有關左右二分法的詳細分析，

<sup>④</sup> Francis Fukuyama, "Patterns of Soviet Third World Policy," *Problems of Communism* 36 (Sep-Oct 1987):2. 有關左右二分法的詳細分析，見 Marshal D. Shulman, *Stalin's Foreign Policy Reapprais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4-7.

在「左翼」戰略時期，共黨強調的是在國內的正統地位與紀律。蘇聯則從世界革命的觀點，致力扶植和支配「第三世界」的共黨政權，或在野的共黨勢力。最明顯的例子是十月革命後的「戰時共產主義」（War Communism）時期。當時布爾什維克黨領袖希望在歐洲，特別戰敗的德國，建立共黨政權。為此，布黨也大力鼓吹殖民地的革命，用來打擊敵視俄國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早在一九二〇年時，布黨即在巴庫（Baku），召開「東方人民大會」（Congress of the People of the East），並在「共產國際」（Comintern）內部成立一個組織，專事對新組成的中共和印尼共黨等，進行控制和運用的工作。布黨甚至在塔什干（Tashkent）組織一支軍隊，對印度北方從事侵略舉動<sup>④</sup>。

史達林死後，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急進戰略，已經大為沖淡。但是蘇共對當地的共黨革命，仍不忘藉機給與支援。較近的實例是布里茲涅夫當政的最後十年（一九七三至一九八一年）。蘇聯除了援助那些自命為馬列主義分子的民族解放運動或共黨政權外，並且意圖使它們轉換為一個真正的馬列先鋒黨派。<sup>⑤</sup>

根據蘇聯的「左翼」戰略，莫斯科在「第三世界」宣傳的對象，基本上是以當地的共黨顛覆分子和共黨政權為主，他們也是蘇聯在「第三世界」擴張影響力量的「代理人」。

雖然貧窮被認為是共產主義滋生的溫床，但「第三世界」的「革命」前景，並沒有像蘇聯預期的那麼樂觀。在「第三世界」地區，共黨被迫與其他同情共黨的非共團體，組成了廣泛的同盟。這些團體包括當地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者，民族解放運動，以及其他「反帝」組織<sup>⑥</sup>。這就成了以「統一戰線」（United front）為基礎的「右翼」戰略時期的特點。

研究共黨的宣傳對象，「統一戰線」是個必須注意的觀念。最早運用統戰策略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雖然他們並未公開提出這個字眼。例如，馬克思曾鼓勵德國共黨和資產階級併肩作戰，共同對抗那些專制王朝、封建地主，以及小資產階級。<sup>⑦</sup>列寧則是第一個把馬克思「統戰」觀念加以系統化運用的共黨領袖。針對「第三世界」地區的特殊環境，列寧提出了工農聯盟的觀念，把馬克思主義者傳統對工人羣衆的注意力，轉移到農民的身上。強調農民為工人階級進行革命時的最佳盟友。

在「右翼」時期，蘇聯宣傳的對象已不再侷限於共黨顛覆分子。甚至蘇聯對於「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態度都有了轉變，共黨政權已非莫斯科爭取的優先考慮對象。蘇聯理論家最後不得不承認，早先希望扶植共黨「代理人」，以及促進蘇聯在當地影響力的企圖已逐漸落空。第三世界新一代的馬列主義盟友；雖願與蘇聯維持密切的軍、政合作關係，但成效不彰。落後加上過早實

<sup>④</sup> Ibid., p.3.

<sup>⑤</sup> Ibid., p.4.

<sup>⑥</sup> Ibid., p.2.

<sup>⑦</sup> Marx and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p.67.

政治合作關係，但反對不平等。之後加上遜尼亞

- ◎ *Ibid.*, p.3.  
◎ *Ibid.*, p.4.  
◎ *Ibid.*, p.2.  
◎ Marx and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1), p.67.

施集體化和國有化的結果，使得「第三世界」的共黨國家，普遍面臨經濟惡化的難題。另一方面，由於缺乏足夠的政治基礎，以及意識形態表現的狹隘特性，使這些共黨政權遭到統治權力的合法性危機。它們對蘇聯經援的渴求，也使蘇聯疲於奔命。到了八〇年代中期，蘇聯共黨中央正式對它的「第三世界」政策，進行公開的討論。<sup>④</sup>

一向對於在落後國家建立真正社會主義制度，持懷疑態度的蘇共中央「國際部」副部長布魯丁茨（Karen Brutents），在八〇年代早期所寫的一系列文章中，主張蘇聯應把它的注意力，從意識形態「純正」，但却弱小的「第三世界」國家，轉移到具有地緣政治重要性的國家。布魯丁茨認為，其中若干國家雖具資本主義傾向，但却具有客觀的反帝潛力。另一個強調第三世界非共黨國家重要價值的蘇聯理論家是雅科列夫（Aleksandr Yakovlev）。雅氏曾擔任蘇聯「世界經濟和國際關係研究所」（Institute of the World Econom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MEMO）所長，在一九八五年被戈巴契夫任命為蘇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雅科列夫是戈某的主要顧問。並且實際負責蘇共「開放」新政策的執行工作。雅科列夫主張採取「多極戰略」（multipol strategy），擴大蘇聯和西歐、亞洲的接觸，爭取美國在上述地區的盟友。一般認為，雅科列夫和布乾丁茨皆主張蘇聯應回到赫魯曉夫時期的，帶有「右翼」戰略特性的「第三世界」政策。此即，加強和當地重要的國家來往，暗地減低對馬列政黨執政國家支持的強調。<sup>⑤</sup>

戈巴契夫的政策，顯然反映了雅科列夫和布魯丁茨的主要意見。在為一九八六年二月蘇共二十七屆大會草擬的「黨綱」中，有下列一段陳述：「蘇聯與被解放國家關係的實際顯示，蘇聯仍舊和那些循資本主義道路發展的新興國家，具有相互合作的真正基礎。這些基礎包括雙方在維護和平，加強國際安全，以及終止軍備競賽方面的共同利益。這些基礎也包含了人民利益和帝國主義強制和擴張政策之間日益尖銳的矛盾；包含了新興國家對下列事實的了解：此即和蘇聯的政治經濟聯繫，有助於加強它們的獨立。」<sup>⑥</sup>

在蘇聯的「右翼」戰略時期，「第三世界」的發展中國家顯然已被區分為下列三大類：①採行不結盟政策，和蘇聯維持友好，甚至依賴關係的國家。這些國家在反西方的觀念上，常常與蘇聯氣味相投（如印度、伊拉克、阿富汗和衣索匹亞）；②表面上不結盟，但却搖擺不定的國家。它們基於內部領導階層的動亂，會從明顯的親蘇，轉向親西方的態度；但有朝一日，也有可能很快地投回蘇聯懷抱（如印尼、迦納、緬甸、埃及和索馬利亞）；③表面上和西方結盟，但在蘇聯刻意爭取下，其親西方立場也會

◎ Fukuyama, "Patterns of Soviet Third World Policy," p.5.

◎ *Ibid.*, pp.5-7.

◎ FBIS, 28 October 1985, p.25.

受到削弱（如土耳其、巴基斯坦）。<sup>④9</sup>

根據以上的分類，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宣傳對象已經多元化了。

## 二、蘇聯的宣傳主題

蘇聯在第三世界的宣傳主題，主要係針對宣傳對象的不同而加以選擇。在此我們要強調的是，蘇聯對於「語意學」（semantics）的濫用。共產黨的「語意學」對西方人來說，是一種極大的障礙物，使西方難以分辨共黨假姿態和真的政策之間的差異，從而無法認清共黨的行動戰術。這種語意學的煙幕，足以掩蔽共黨挑戰的真正性質，並且使西方錯認社會主義陣營充滿了思想的矛盾。然而，在共產黨人的詞彙中，許多概念都是表面矛盾而實際統一的。以西方的傳統解釋，這類事務極難理解。<sup>⑤0</sup>在蘇聯對「第三世界」宣傳所選擇的主題中，有許多我們非共世界最熟悉的字眼，但共黨的解釋却和我們的認知，有相當大的距離。以下我們僅列舉一些蘇聯宣傳常用的主題，並說明蘇聯提供的特殊看法：

〔1〕「民族主義」（nationalism）：共產黨人傳統上從階級和唯物的觀點來分析民族主義這個概念。例如，對馬克思、列寧，以及後來的史達林而言，「民族國家」（nationstate）乃是某一特定歷史階段，以及某一特殊社會經濟結構下的產物。隨着共黨革命的開花結果，民族和種族的自我認同感會逐步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世界工人羣衆的團結。換言之，馬、列等人認為階級意識的潛在力量超過民族主義。<sup>⑤1</sup>根據此一觀點，蘇聯政治字典中，將「民族主義」界定為：

「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涉及民族問題事務的意識形態和政策。民族主義將民族視為存在於歷史之外，凌駕於階級架構之上的一個社會羣體的最高形式。同時，民族也被視為一個調和的實體，其具有的共同基本利益，為內部社會各階層的成員所分享。民族主義常經由民族優穢和民族排他性的觀念突顯出來。上述的觀念或多或少地在歷史環境，以及某一民族與其他民族關係的基礎上，加以發展。」<sup>⑤2</sup>

反動階層常常利用民族主義來削弱工人羣衆的階級意識：民族衝突妨礙了工人為其階級利益進行的鬭爭。但在民族解放運動的某一定階段，被壓迫人民的民族主義，可被用來作為民族復興綱領的基礎，以及用來對抗帝國主義，爭取政治和經濟獨立過程中的策略。」<sup>⑤3</sup>

<sup>④9</sup> Alvin Z. Rubinste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 in Stephen F. Cohen, Alexander Robinowitch, and Robert Shibley, eds., *The Soviet Union Since Stali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329.

<sup>⑤0</sup> Peter S. H. Tang, "Moscow and Peking: The Onset of War and Peace," *Orbis* 5 (Spring 1961):15-16.

<sup>⑤1</sup> Stanley Rothman and George W. Breslauer, *Soviet Politics & Society* (St Paul, Minnesota: West Publishing-Co., 1988) p. 130.

<sup>⑤2</sup> Putrin, *Political Terms*, p.49.

上述的界定，明顯地表達了共黨對於民族主義所持的雙重態度。而在蘇聯境內，由於俄羅斯人約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因此從列寧以降，蘇聯領導人物即對民族問題抱着兩種看法：一方面視非俄羅斯民族為潛在的威脅；另一方面則將它們作為散播社會主義的工具，以及看作經濟、軍事、人口和文化的「資產」。

- ② Alvin Z. Rubinstei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ld," in Stephen F. Cohen, Alexander Robinowitch, and Robert Shrule, eds., *The Soviet Union Since Stali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329.
- ③ Peter S. H. Tang, "Moscow and Peking: The Onset of War and Peace," *Orbis* 5 (Spring 1961): 15-16.
- ④ Stanley Rothman and George W. Breslauer, *Soviet Politics & Society* (St Paul, Minnesota: West Publishing-Co., 1988) p. 130.
- ⑤ Putrin *Political Terms*, p. 49.

上述的界定，明顯地表達了共黨對於民族主義所持的雙重態度。而在蘇聯境內，由於俄羅斯人約佔全部人口的百分之五十，因此從列寧以降，蘇聯領導人物即對民族問題抱着兩種看法：一方面視非俄羅斯民族為潛在的威脅；另一方面則將它們作為散播社會主義的工具，以及看作經濟、軍事、人口和文化的「資產」。

蘇聯的傳播者，使用了俄國的經驗，來說明共黨如何將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可能矛盾，加以策略性的統一。蘇聯宣傳家認為，一九一七年在歐俄烏克蘭和白僅羅斯地區革命的成功，幫助了中亞和高加索殖民地的人民，完成了他們的民族解放鬪爭，使他們加入了蘇聯的社會主義社會。根據此一「意識形態模式」，蘇聯宣傳家認為，蘇聯顯然是「第三世界」國家必須仰賴的盟友。就蘇聯而言，反殖民主義雖然導致政治上的獨立，但並非表示鬭爭即告結束。因為，資本主義只是改變了它剝削「第三世界」的方法和程度而已。時至今日，蘇聯宣傳家強調的是西方對亞非等地的介入，認為殖民主義已被新殖民主義所取代。至此地步，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提供「第三世界」新興國家的希望。<sup>②</sup> 總而言之，蘇聯的目的是在落後地區民衆和西方工業國家之間，製造一道鴻溝，並且促使這些民衆對蘇聯和其他共黨國家，產生好感。<sup>③</sup>

(二)「現代化」(modernization)：蘇聯對「第三世界」宣傳所灌輸「現代化」觀念，主要指的是蘇聯本身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經驗。實際上，蘇聯寧可使用「進步」(progress)的概念，來取代快速的現代化。<sup>④</sup> 蘇聯宣傳家認為，俄國在一九一七年時，本屬一個世界上最大的落後國家。由於轉變了它的社會和經濟基礎，而能成就今天的超強地位。「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也可運用蘇聯的例子從事建設，特別是在獲得社會主義陣營的支持和經濟援助後，更容易達到目的。<sup>⑤</sup>

提及蘇聯的發展模式，我們必須作一簡單的歷史回顧。俄國本屬農業國家，經由外來的投資幫助，在本世紀初葉才開始發展其製造工業。從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一年期間，俄國採取的是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企圖採取全面的經濟社會化，來挽救因爲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內戰而遭到摧殘的經濟狀況。三年的「戰時共產主義」試驗，使俄國經濟幾乎瀕臨崩潰的邊緣。一九二一年四月，列寧被迫進行暫時的後退，採取了「新經濟政策」，希望使俄國經濟恢復到戰前的水準。一旦完成此一目標，蘇聯將二度進行社會化的工作。從一九二八年開始，蘇聯展開第一個五年計劃，以農村的全面集體化，伴隨急速的工業化措施。在俄國歷史上，此一被稱爲「二度革命」的經濟政策，付出了大量人命犧牲的代價。但是，在史達林一九五三年去世時，蘇聯已經從落

- ② Ott Pick ("Introduction: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spects," in E. J. Feuchtwanger and Peter Nailor, 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Third Word*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1), p. 5.
- ③ Frederick C. Barghoor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4), p. 162.
- ④ *Ibid.*, p. 166.
- ⑤ Pick, "Introduction: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Aspects," p. 9.

後的農業國家，一躍而為現代化的工業國家。連續戰後幾個五年計劃下來，確保了蘇聯經濟的快速成長。到六〇年代末期，蘇聯已擁有原子和核子能力，並且成為太空探測科學的先驅。<sup>⑤7</sup>

為了避免「第三世界」國家像蘇聯那樣，因為急速工業化而付出的社會革命「代價」，蘇聯宣傳家強調，只要這些國家採取削弱西方影響力的政策，它們可以透過蘇聯的協助，達到經濟和社會的實質進展。<sup>⑤8</sup>

① 「和平」(Peace)：在蘇聯的對外宣傳中，「和平」是一個常常被使用的主題。共產黨人一向以辯證的方式，來解釋「和平」這個概念。所謂「為和平而奮鬥」(struggle for peace)一詞，代表的就是馬列主義邏輯下的產物。根據布里辛斯基(Zbigniew K. Brzezinski)的看法，蘇共相信人類社會不可避免地會步向社會主義，而戰爭只是資產階級用來阻礙此一歷史階段發展過程的手段。在此情況下，布里辛斯基認為，共黨必須確認他們是屬於和平的一方，因為他們不能和屬於他們的歷史「進程」相對抗。<sup>⑤9</sup>另一方面，從列寧以來的蘇共領袖都相信，如果不經由激烈的鬭爭，蘇聯共產主義的目標是無法達成的。但他們也了解世人厭戰的自然心態，於是，尋求和平遂成了蘇聯對外宣傳的「口頭禪」；資本主義則被形容為訴諸戰爭的社會制度。只有將資本主義消滅，人類才有達到持久和平的一天。<sup>⑥0</sup>

為了達成永久和平的目標，蘇聯的一本對外政策教科書，將第二屆「蘇維埃大會」(Congress of Soviets)通過的「和平律令」(Decree on Peace)，視為蘇聯政府的第一個對外政策文件。這個文件着重的就是如何解決戰爭與和平的重要問題。蘇聯學者強調，「和平律令」的頒佈，像徵從當時的蘇維埃共和國開始，就已經擔負了領導全世界人民，對抗帝國主義及其侵略和殖民壓榨政策的重責大任。<sup>⑥1</sup>

對於「第三世界」國家，蘇聯的宣傳將自己描繪成和平的維護者。儘管基於現實政治的考慮，蘇聯運用「和平共存」的策略，處理它和不同社會制度國家的關係。但蘇聯一直強調「和平共存」並不意味雙方意識形態鬭爭的消除。蘇聯在宣傳上仍標榜支持落後地區的民族解放鬭爭。對蘇聯而言，任何對抗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發展的另一階段)的戰鬪，都屬於「正義」的戰爭，並不違反蘇聯對於「和平」的承諾。

與「和平」相關聯的另一個蘇聯常用宣傳名詞是「裁軍」。蘇聯宣傳家強調，早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寧即表示：「裁軍是社

⑤7 Vadim Medish, *The Soviet Uni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5), pp. 141-142.

⑤8 Barghoor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pp. 174-175.

⑤9 Ibid., pp. 80-81.

⑥0 Ibid., pp. 82-83.

⑥1 Popov, *A Stud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pp. 12-13.

會主義的理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沒有戰爭存在的，裁軍的目標也就因此得以完成。」<sup>⑥2</sup>蘇聯覺得，基於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對於武器競賽產生的恐懼心理。「裁軍」的口號可以為莫斯科在海外爭取廣泛的盟友；同時也可使西方，特別是美國，對其海外駐軍的行動，產生一種「罪惡感」。

◎ Vadim Medish, *The Soviet Union*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Hall, Inc., 1985), pp. 141-142.

◎ Barghoor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pp. 174-175.

◎ *Ibid.*, pp. 80-81.

◎ Popov, *A Study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pp. 12-13.

會主義的理想，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是沒有戰爭存在的，裁軍的目標也就因此得以完成。」<sup>◎</sup>蘇聯覺得，基於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對於武器競賽產生的恐懼心理。「裁軍」的口號可以為莫斯科在海外爭取廣泛的朋友；同時也可使西方，特別是美國，對其海外駐軍的行動，產生一種「罪惡感」。

④安全（Security）..從一九六〇年代末期開始，「安全」和「集體安全」的概念，不斷在蘇聯的對外宣傳文件中出現。根據蘇聯學者的看法，一般研究安全問題的人士和政治人物，都從傳統的觀點，將安全概念解釋為僅包含軍事安全；時至今日，他們更應注意政治、經濟、社會，甚至心理與道德等其他層面的意義；安全不應視為抽象與靜態的事物，而應視為一個變動與演進的過程；安全具有聯繫國內與國外，現存與發展中事務的功能。解釋安全概念的最佳方法。是研究國家、集團或社會制度對安全問題所採路線的趨向。<sup>◎</sup>

對於蘇聯而言，屬於不同社會制度的人，對安全問題必有不同的看法。蘇聯亦根據其主觀的意識，來解釋與安全概念具有密切關係的「集體安全」一詞。表面上，蘇聯接受聯合國憲章的規定，認為這是各國組成區域集體安全組織的法律依據。但蘇聯却強調只有「華沙公約組織」、「阿拉伯聯盟」（Arab League）和「非洲團結組織」（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是合法的。<sup>◎</sup>其他像「東約組織」（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SEATO）和「中約組織」（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 CENTO）等，則不被視為集體安全組織。蘇聯認為它們「實際上屬於侵略性的帝國主義聯盟」，是「西方戰略家用來對付世界社會主義和民族解放力量的工具。」因此，這些組織的成立和行動「違反聯合國憲章」，「違背當地和平反安全的原則」。<sup>◎</sup>

蘇聯顯然是從參與國的階級成分和政治態度，來看待集體組織。如果一個集體安全組織的成員國，其內部遭到共黨滲透，或發生共黨革命，則其他非共國家不得支援剿共活動；相反地，共黨國家在面對外來侵略或內部「反革命」的威脅時，則可相互援助，認為這是符合集體安全體系的原則。<sup>◎</sup>蘇聯的此一解釋，又是典型的辯證法則的運用。

蘇聯除了向第三世界」銷售其「集體安全」的概念外，也不忘記對西方賴以維持區域安全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 V. Sobakin, *Marxism-Leninism on War and Peace*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3), p. 132.

◎ M. Dobroieiski,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European Security,"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scow, June 1972): 35.

◎ Quoted in Charles T. Baroach, *The All-European System of Collective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ts Dialectical Interpretatio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1973), p. 35.

◎ *Ibid.*, p. 36. See also V. Pavlovsky, "Collective Security: The Way to Peace in As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July 7, 1972): 24.

◎ *Ibid.*, p. 38.

power）概念，大肆加以抨擊。蘇聯的宣傳強調，這是一個危險的概念，因為它「不能保證小國不會遭到帝國主義者侵略」，「也不能對大國苟以維護地區和平和安全的責任。」蘇聯表示，這個世界已經目睹了許多因帝國主義國家違反相互權力平衡，而導致衝突和軍事對抗的例子。最具體的實例是：「帝國主義對越南的入侵，以及中東危機情形的發展。」<sup>⑤7</sup>

(2)「合作」(Cooperation)：在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宣傳文件中，「合作」主要指的是政治和經濟兩方面的關係。蘇聯很少提到軍事合作的事例，或許為了避免使這些落後國家正視蘇聯戰後明顯的軍事擴張主義傾向。蘇聯認為，它和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合作，具有下列的客觀基礎：雙方對於反對新殖民主義，對抗種族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政權，對抗國際關係中的各種歧視，以及致力於加強和平安全和廣泛平等合作等重要問題，具有共同的利益。<sup>⑤8</sup>

在經濟領域方面，蘇聯把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特色」，視為雙方關係性質的因素。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第三世界」國家，是蘇聯合作的第一類對象，這些國家的工業有百分之八十是國營，採取的是計劃經濟，並且致力於農村改革和提高工人生活水準。

其次是鄰近蘇聯的國家，它們對蘇聯具有歷史、政治和經濟的重要價值。

近年來，蘇聯也注意到亞、非、拉丁美洲國家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現象。對於貧窮國家，蘇聯強調的是經濟援助。涉及那些擁天然資源和財政資源的國家，蘇聯則宣傳合作在互利和商業的基礎下進行。

總而言之，蘇聯提出的一般經濟合作前提包括：經濟上的互補；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以及在燃料和原料物質等方面從事交換的可能；具有生產那些經濟合作夥伴所需物品的潛力；發展中國家對於購買蘇聯工業裝備，以及對於借助蘇聯經驗抱持相當興趣等。<sup>⑤9</sup>根據這些前提，蘇聯對於不同類型的「第三世界」國家，採取了不同的合作方式。

## 肆、蘇聯的宣傳媒體

蘇聯政府一向運用各種現代傳播媒體，來傳播它對外宣傳的主題。除了傳統的文字和廣播媒體外，「面對面接觸」(face-to-face contacts)和「前衛組織」(front organization)的運用，也皆受到蘇聯傳播者的重視。本文僅就文字、播廣、「面對面接觸」和「前衛組織」四項宣傳媒體，分別敘述其在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宣傳活動中，發揮的重要功能。

⑤7 Ivan Kovalenko, *Soviet Policy for Asian Peace and Securit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9), p.258.

⑤8 M.M. Maksimova, *USSR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9), p.154.

⑤9 *Ibid.*, pp.155-157.

- ⑤ Ivan Kovalenko, *Soviet Policy for Asian Peace and Security*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9), p. 258.
- ⑥ M.M. Maksimova, *USSR and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9), p. 154.
- ⑦ Ibid., pp. 155-157.

## 一、文字宣傳

蘇聯的官方通訊社「塔斯社」(Telegraphic Agency of the Soviet Union, TASS) 在全球一百一十五個國家，派遣了大約二百名的記者。「塔斯社」每天平均傳送量達一千小時以上的資料，給它全球各地的外國記者。自一九七九年開始，即擔任「塔斯社」社長的羅塞夫 (Sergei A. Losev)，是蘇共「中央檢查委員會」(Central Audit Commission) 的委員。⑧ 值得注意的是，「塔斯社」駐外記者除了負責收集當地的各種訊息外，同時也扮演宣傳者的角色。曾於一九五五年主管「塔斯社」社長的帕谷諾夫 (Nikolai Palgunov) 在他的一本著作中指出：「『塔斯社』要求它的駐外記者，運用其所有的特權，參與法庭的訴訟程序，旁觀各種政治示威活動以觀察羣衆的心態，接受官方發佈的新聞稿，出席記者招待會。」此外，駐外記者還應從他們接觸的民衆生活中挖掘新聞，以便了解駐在國各種社會政治勢力和團體的性質。蘇共「高級黨校」(Higher Party School) 出版的一本「新聞學要目」(Program in Journalism) 課程講義中，更暗示那些駐在拉洲、美洲和東方地區的蘇聯記者，應和當地民族資產階級的新聞媒體建立合作關係，為了促使這些國家的經濟生活，從外國的影響之下解放出來，努力奮鬥。⑨

另外一個重要的蘇聯通訊社名為「消息社」(Novosti, News)。「消息社」表面上是非官方，但實際上受到蘇共的控制，社長托庫諾夫 (Lev N. Tolkanov) 畢業於蘇共「高級黨校」，現為蘇共中央委員。「消息社」宣稱和一百二十個外國出版公司，以及一百四十個國際和外國新聞通訊社有來往。「消息社」並且和六千種外國期刊，七十家外國電視公司訂有合同。「消息社」在一百一十五個國家設有分社和派駐記者。該社並且將蘇聯的新聞翻譯成五十六種語言。除此之外，「消息社」也提供資料給國外出版的五十種雜誌、十份報紙，以及一百種新聞簡介。「消息社」宣稱每年分送的書達四千五百冊，出版品達三千萬份。⑩

對於「第三世界」較為落後的地區而言，報紙和雜誌的傳播，可能較書本容易。在這方面，蘇聯大約有二十種以上的期刊，以當地不同的語文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今日亞非」(Asia and Africa Today) (以兩種語文出版)、「文化與生活」(Cultures and Life) (五種語文)、「新時代」(New Times) (十種語文)、「蘇聯文學」(Soviet Literature) (十種語文)、「蘇聯」(Soviet Union) (十種語文)以及「蘇聯婦女」(Soviet Woman) (十四種語文)。此外，以傳播共黨意

⑧ Staar, *USSR Foreign Policies After Detente*, p. 76.

⑨ Banghor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p. 208.

⑩ Staar, *USSR Foreign Policies After Detente*, pp. 76-77.

識形態爲主的「世界馬克思主義評論」(World Marxist Review)月刊(以四十種語文在七十五個國家出版)，以及時事報導爲主的「莫斯科新聞」(Moscow News)周刊(以英、法、西班牙和阿拉伯文四種譯本，在一百四十個國家發行)，也在蘇聯對「第三世界」的文字宣傳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書刊社方面，莫斯科的「進步出版公司」(Progress Publishing House)，提供了二百八十名譯者將列寧的著作，蘇聯的社會政治作品，以及蘇共大會的文件等，以四十種外國語文，向八十多個國家發行。<sup>⑩</sup>

總之，根據最新的資料統計，蘇聯對「第三世界」地區，已提供了六十八種語文的出版資料。有些是專爲「外銷」而著，有些則是翻譯蘇聯的作品。<sup>⑪</sup>

### 110 對外廣播

列寧曾經形容電臺是一種「沒有紙張和沒有距離」的報紙。<sup>⑫</sup>蘇聯的對外廣播始自一九三三年，初時是以德語長波播出，短波則從一九三四年開始。<sup>⑬</sup>沿至今日，「莫斯科電臺」(Radio Moscow)的海外廣播，僅在一九八五年一年內，就已使用六十四種語言，平均每週一千六百八十分鐘節目時數，向外播出。<sup>⑭</sup>

成立於一九六四年的蘇聯「和平與進步電臺」(Radio Peace and Progress)，表面上號稱獨立，實際上亦受到政府的完全控制。此一電臺每週以十五種語言和方言對外播出一百六十小時。「和平與進步電臺」對西半球播出的節目充滿反美和高度煽動的色彩。例如，該電臺在一九八一年播出時，曾引述一名游擊隊的話說，古巴可能對薩爾瓦多進行軍事干預。<sup>⑮</sup>

在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廣播宣傳活動中，座落在蘇聯境內，由流亡國外共黨領袖所操縱的秘密電臺，也時常成爲蘇聯實施對外政策的工具。其中最著名的是針對中共軍方的「八一電臺」(Radio Bayi)和以伊朗爲目標的「伊朗國家之聲」(National Voice of Iran)。在中蘇共關係陷入低潮的時刻，蘇聯常利用「八一電臺」，發表反中共言論，並且製造中共軍隊派系衝突和

<sup>⑩</sup> Ibid., pp.77-78.

<sup>⑪</sup> Carol R. Saivet and Sylvia Woolly, *Soviet-Third World Relations*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5), p.159.  
<sup>⑫</sup> Quoted in Barghoor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p.279.

<sup>⑬</sup> Ibid.,

<sup>⑭</sup> 出處：「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最便宜的十種語言，每週播出一至三小時。Philip G. Roeder, *Soviet Political Dynamics: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Leninist Po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8), p.412.

<sup>⑮</sup> Starr, *USSR Foreign Policies After Detente*, pp.74-75.

黨軍矛盾。至於「伊朗國家之聲」，蘇聯早在德黑蘭美國使館被佔領之前，就已利此一電臺，發表許多煽動性的言論。當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美國人質事件發生後，「伊朗國家之聲」仍繼續煽動伊朗羣衆，採取進一步暴力行動。<sup>⑯</sup>

◎ Quoted in Barghoor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p.279.

◎ Ibid.,

◎ 出較N·，「美國N社」(Voice of America)司理亞國十一種語文，海選書出一十川印第六小壁。說Philip G. Roeder, *Soviet Political Dynamos: Development of the First Leninist Polic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8), p.412.

◎ Staar, *USSR Foreign Policies After Detente*, pp.74-75.

黨軍矛盾。至於「伊朗國家之聲」，蘇聯早在德黑蘭美國使館被佔領之前，就已利此一電臺，發表許多煽動性的言論。當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七日，美國人質事件發生後，「伊朗國家之聲」仍繼續煽動伊朗羣衆，採取進一步暴力行動。<sup>◎</sup>

### 三、前衛組織

對共產黨人自言，「統一戰線」不僅是語意上的策略，同時也是一種組織戰略。從組織的觀點看，共黨的目標是要欺騙、腐蝕或威脅非共政治人士，並且滲透非共組織，使他們成為共黨權力體系的組織部份。值得注意的是，當蘇聯運用其他國家的共黨組織，藉以傳達莫斯科的訊息時，比較容易引起大眾的警覺。而國際共黨前衛組織所披戴的外衣，則常常收到耳目混淆的效果。這些組織沒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有時甚至標榜獨立自由的路線，故能成為蘇聯轉移世人注意的對外政策工具。

在蘇聯運用的諸多國際組織中，最重要的是「世界和平會議」(World Peace Council, WPC)、「世界工會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WFTU)、「世界民主青年聯盟」(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Youth, WFDY)、「國際學生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 IUS)，以及「亞非人民團結組織」(Afro-Asian Peoples' Solidarity Organization, AAPSO)等。這些組織最大的功能是透過國際會議及在一些非共國家內部，爭取對蘇聯外交政策有利的廣泛支持。舉例而言，「世界工會聯盟」於一九八一年一月，在古巴哈瓦那舉行的第十屆世界大會時，曾提出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的呼籲，要求工會權力和民主自由，歐洲安全與裁軍，與阿拉伯和南非人民團結一超，以及支持拉丁美洲的進步運動等。這些建議當中，許多是合乎蘇聯對「第三世界」宣傳的主題。同樣地，由「世界民主青年聯盟」和「國際學生聯盟」召開的一些會議，也反映了「世界和平會議」的聲明，即呼籲「和平、裁軍和和解」，以及終止「帝國主義的壓榨」。<sup>◎</sup>

蘇聯利用前衛組織傳達外交訊息的另一個具體實例是蘇聯對於「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宣傳。當布里茲涅夫於一九六九年在莫斯科世共大會提出這個概念後，亞洲國家的一般反應相當冷淡。於是，蘇聯除了派人到亞洲國家進行遊說外，更透過共黨前衛組織，展開全面性的宣傳活動。

來自二十六個國家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於一九七三年五月，在孟加拉首都達卡(Dacca)，召開了「亞洲安全合作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Asia)。「世界和平會議」和「亞非人民團結組織」在會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更重要的是，蘇聯認為達卡會議發表的一些聲明原則，完全「符合蘇聯所提在此地區建立集體安全建議的原則」。因此，蘇聯強調，它所提出的集體安全概念，已經得到此「亞洲和平勢力」所召開的首次國際會議的認可。蘇聯

◎ Ibid., p.75.

的建議，也成為整個地區公眾運動的一個行動的綱領。<sup>④</sup>

#### 四、面對面接觸

除了利用正常的外交管道，在國外從事宣傳活動外，蘇聯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它擁有一項「天然的」國外宣傳媒介，那就是地區性的共黨組織。根據一項統計資料顯示，「第三世界」目前總共有六十個非執政共黨組織。這些地區共黨人數，少則一百人左右，多的號稱超過兩萬人。在人數較多的「第三世界」共黨組織中，阿根廷共黨人數為六萬五千人，墨西哥共黨為二十萬人左右，印度共黨組織分為親蘇和親中共兩派，合計約七十萬人左右。這些地區共黨在國內的地位和影響力或有不同，但皆被蘇聯視為它實施對外政策的潛在工具。<sup>⑤</sup>

蘇聯和西方先進國家的學術交流，主要為了獲取技術情報。而蘇聯和發展中國家的交流，則具有短程和長程的宣傳考慮。在短程方面，蘇聯希望藉學術交流而製造一個印象，即莫斯科可以提供較好的教育機會。為了達此目的，蘇聯政府本身或透過其國際前衛組織，提供亞、非、拉丁美洲國家人民獎學金；在長程方面，蘇聯的宣傳目標是在「第三世界」國家，培養親蘇或傾向共黨的精英分子。<sup>⑥</sup>

蘇聯藉培養「第三世界」人才以擴大影響力的最佳實例是，一九六〇年在莫斯科創立的「魯孟巴人民友誼大學」（*Patrice Lumumba Peoples' Friendship University*）。這所大學提供俄文及其他政治、經濟、法律等課程。學生住宿免費，每月且可領取八十到九十盧布的食物津貼。根據「莫斯科電臺」一九八五年二月的報導，已經有一萬三千名該校畢業生散布在「第三世界」地區的一百一十個國家。這些人除了支持蘇聯的對外政策外，甚至參加了當地共黨顛覆活動。<sup>⑦</sup>

在「新人性主義」（New Humanism）的口號下，「友好協會」（Friendship Society）在蘇聯對外宣傳活動中的角色，日益受到重視。在蘇聯，這些個別協會的主席，常常由著名的學者專家擔任。他們在與國外相對團體和人士的接觸中，灌輸蘇聯的價值，以及製造有利蘇聯的國家形像。「友好協會」的活動，經常刻意受到蘇聯報紙和電臺的報導，顯示出它在宣傳方面的價值。<sup>⑧</sup>

④ Kovalenko, *Soviet Policy for Asian Peace and Security*, pp. 271-272.

⑤ Saivetz and Wooldy, *Soviet-Third World Relations*, p. 162.

⑥ Barghoor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pp. 274-275.

⑦ Staar, *USSR Foreign Policies After Detente*, p. 79. See also FBIS, 11, February 1985, p. R-16.  
⑧ London,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p. 295.

(3) Kovalenko, *Soviet Policy for Asian Peace and Security*, pp. 271-272.

(2) Saivetz and Woody, *Soviet-Third World Relations*, p. 162.

(3) Barghoorn, *Soviet Foreign Propaganda*, pp. 274-275.

(4) Starr, *USSR Foreign Policies After Detente*, p. 79. See also FBIS, 11, February 1985, p. R-16.

(5) London 'The Making of Foreign Policy,' p. 295.

## 伍、結論

在國際社會中，以宣傳作為對外政策的工具，並非蘇聯的專利，有許多實例顯示，非共國家，特別是身為另一超級強國的美國，也不斷地運用各種媒體，實施它對「第三世界」的政策目標。但從本文的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蘇聯對「第三世界」展開宣傳攻勢時，明顯地具有下列幾項特點：

第一、蘇聯的宣傳組織相當完備，無論是宣傳主題的選擇或是宣傳媒體的運用，幾乎都是由上而下，受到政府和共黨的嚴密監督和控制。這是極權政治體系和權威型政治體系的一個特色，非共世界國家在這方面難以比擬。

第二、蘇聯的宣傳主題雖然帶有濃厚的共黨意識形態色彩，但是，針對客觀環境的改變，蘇聯宣傳家也隨時調整他們對外宣傳的內容。明顯的事實是，隨着新興國家的獨立，蘇聯的宣傳的口號已從反殖民主義，變成了反新殖民主義；另一方面，當蘇聯發現「史達林主義模式」不適於某些發展中國家時，諸如「經濟合作」等新的口號立刻取而代之。蘇聯了解「第三世界」國家普遍存在着安全的需求，希望一個和平安定的國際環境來從事現代化的建設。於是，蘇聯立刻提出了「集體安全」和「裁減軍備」的動人口號。

第三、蘇聯在從事對外宣傳的過程中，竭盡所能地運用各種宣傳技巧，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蘇聯甚至提供「第三世界」國家技術援助，作為影響當地公眾媒體的一個手段。例如，蘇聯與南葉門簽訂的一項協定，幫助後者在亞丁（Aden）建立一個兩百瓦短波電臺發射機，範圍可達整個阿拉伯世界。蘇聯同時也和阿爾及利亞、埃及、敘利亞等進行電信方面的合作。<sup>④</sup>

第四、蘇聯對於它的宣傳對象，顯然經過有系統的分析和研究。以「第三世界」為例，蘇聯除了依賴其在當地的共黨盟友外，也有效地運用「統戰」策略，廣泛地爭取同情者和支持者。換言之，蘇聯選擇對象並無固定的標準，活動空間很大。

最後，我們要強調的是，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宣傳，實際上就是蘇聯對整個非共世界心理作戰攻勢的一部份。宣傳和心理作戰，顯然具有不同的意義。一名西方共黨問題專家曾為此作了一個很有趣的比較。他認為宣傳的過程，如果比喻為向一名婦人推銷化粧品，則心理作戰的過程則是試圖改變這名婦女的臉孔，使之適合共黨所欲推銷的「化粧品」。換言之，共黨的心理作戰，是一項改變其對手心靈的過程，使非共人士在缺乏精神武裝的狀態下，接受共黨所作的各種安排。

評估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宣傳成果，本身就是一項痛苦的經驗。雖然，我們目睹了許多蘇聯「外交官」在亞、非、拉丁美

④ Starr, *USSR Foreign Policies After Detente*, pp. 78-79.

⑤ Possony, "Communist Psychological Warfare," p. 202.

洲國家遭到當地政府驅逐出境的事實，我們也耳聞這些國家對蘇聯推銷的「宣傳品」興趣缺缺，但大體說來，蘇聯對「第三世界」的宣傳仍具有相當程度的效果。蘇聯反覆宣傳的一些口號，已逐漸成為當地民眾認知圖案的一部份。許多標榜中立和不結盟的國家，不知不覺地成為蘇聯對外政策的傳聲筒。蘇聯的成功，主要建立在「第三世界」對共黨宣傳缺乏認識和警覺的基礎上。當西方國家期盼新的和解時刻即將來臨，而戈巴契夫的外交箭頭轉向「第三世界」的時刻，非共人士似乎應對蘇聯發動的新一回合和平攻勢，給與密切注意了。